

1. 做人第一，学问第二

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如果你要学习文化知识，精通学问之道，也只有从做人的体会、人生的经验入手，才能够学有所成，学以致用，而不会成为读死书的书呆子。

孔子说：“同学们在父母面前要孝顺父母，与兄弟相处要尊敬兄长；说话要谨慎而讲信用；博爱大众而特别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。做到了这些之后，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。”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如果你要学习文化知识，精通学问之道，也只有从做人的体会、人生的经验入手，才能够学有所成，学以致用，而不会成为读死书的书呆子。这也就是说做人首先要注重品德修养，其次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。德育第一，智育第二，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。可见，不论是德育第一、智育第二的教育方针，还是开设“德育”“公共课”“设专职”“德育教授”，都是持之有故，继承着儒教传统的。

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：“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，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于用知识去弥补。”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做人的基本准则。

孔子强调仁德是礼乐的前提，他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意思是“作为一个人却没有仁德，那礼还对他有什么意思呢？作为一个人却没有仁德，那乐还对他有什么意思呢？”仁德是礼乐的前提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仁德，像季氏那样，僭越天子之礼，滥用天子之乐，那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做人要重视“仁德”。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。在孔子看来，仁德是做人的根本，是处于第一位的。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、学礼乐才有意义。孔子还认为，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，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。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（《里仁》）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（《季氏》）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。

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？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（《颜渊》）也就是说，只有克制自己，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。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，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。可见“仁”不是先天就有的，而是后天“修身”、“克己”的结果。

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，这就是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。”（《子路》）即刚强、果断、质朴、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。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，即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（《阳货》），即恭谨、宽厚、信实、勤敏、慈惠。他说：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，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，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，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，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。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，就可算是仁了。

当然，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。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，那就是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（《颜渊》）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，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。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，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。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，也使别人站得住，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，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。即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（《雍也》）

说穿了，文化也好，艺术也好，都是为道德传播，更进一步说，都是为政治的等级制度服务的，所以，一定要服从于道德和政治的前提。

要重视自我修养。孔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《里仁》）

在孔子看来，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，不论在任何条件下，都不能离开仁德。同时曾子认为，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：一是“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”；二是“正颜色，斯近信矣”；三是“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”（《泰伯》），也就是说，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

貌，端正自己的脸色，注意自己的言辞。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、信任、温和。

同时孔子还认为“君子泰而不骄（《子路》）；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”（《卫灵公》）；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亡不已知也。”“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。”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，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，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；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，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。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。

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（《学而》）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：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？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？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？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。

在此基础上，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。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即志向在于道，根据在于德，凭藉在于仁，活动在于六艺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。

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？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，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。他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泰伯》）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，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，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。所以，对于个人修养来说，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。

思考是看书的最好方式，那往往能将体验和知识，融入到自己既有的知识和感觉体系中。正如孔子所说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这明确讲出了学与思的关系。

有次，孔子问子贡：“你与颜回谁强？”子贡说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，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“你看！颜回的思维能力强，举一反三，而子贡呢？自认为只能举一反三。孔子接着实事求是地讲：“比不上呀！我与你都比不上他呀！”可见，孔子认为颜回的思维能力比自己还强，无怪乎那么喜欢这位得意门生。

孔子深知思维能力的重大作用，在《论语》的《里仁》与《卫灵公》两篇中，孔子都讲了“一以贯之”，明确他是以一个基础道理来贯穿他所有的学识的，即从所有学识中体悟与提炼出最本质的东西，这就是他思维

能力的深刻性。

他对于学习不但十分重视做人，又重视实践。学，是指向实践学习 学习做人、做学问 时 是指经常 也是指及时 习 不是指温习 而是指实践、实习。所以 这句话是讲 要向实践学习 学习做人、做学问 而且经常及时地加以实践，这件事非常高兴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第二句话：‘有朋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！’向实践实习 当然包括向群众学习，向朋友学习，更包括向自远方而来的朋友学习。向远方而来的朋友学习 当然更加高兴。

孔子强调实践重要，决不是讲读书不重要；我们强调某一件事重要，只因为对这件事重视得不够，而不是讲另一件事就不重要，逆定理不一定成立。《先进》就讲了读书重要。子路要派子羔去费城做官 孔子反对 讲子羔的书没读好 这是害了子羔。子路反驳：“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 然后为学？”这是讲 费城有群众 有政府 可向群众、官员学习 何必读书 才算学了呢 孔子生了气讲：“你狡辩 我讨厌！”其实，如果孔子不重视读书，又何必开私人办学之先河，又何必花牛劲去整理古代文献资料而成为不朽的经典呢？但孔子深深知道，“行”，实践，是个根本。

由此，就不难理解孔子的高徒子夏所说的衡量学习与否的标准不是看学历 不是看文凭 而是看你的行为 看你的言谈举止了。

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就是说：“尊重贤能的人超过爱美丽的女人；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；侍奉君王能鞠躬尽瘁；与朋友交往说话守信用。这样的人，虽然说没有学习过什么，我也一定要说他是学习过的了。”

作为孔子的高足之一，子夏可以说是深得老师的真传。

可见孔子说：“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。”子夏说：“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。”都是教人求实务本 学以致用 先做人 后做学问。

说来也是，一个人尽管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 如果行为方式、言谈举止乖谬愚笨，不能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相反，一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凭，没有进过大学校门，但他言谈举止得体，行为方式正确 能够有所创造 有所发明 难道你能够说他没有学习过什么吗？

这就是做人第一 学问第二 要求实务本 学以致用 的道理。

2. 快乐比知识更重要

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世上究竟有多少种快乐？恐怕谁也说不清。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受他人所累，而让自己身心舒畅。当然，大快乐与小快乐是有区别的。所谓大快乐，即指精神的快乐；所谓小快乐，即指眼前的快乐。

对某件事来说 求知者不如爱好者 爱好者不如乐之者。“乐之者”是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，快乐的心态让人充满智慧，直接指向成功。

有人问希腊智者伊壁鸠鲁：“快乐的秘密何在？”

伊壁鸠鲁说：“生命中有三种欲望：一种是自然而必要的，另一种是自然却不必要的；还有一种是不自然也不必要的。对不必要的欲望不要屈服，对自然的欲望要追求，这就是快乐的秘密。”

伊壁鸠鲁说的这三种欲望分别属于孔子说的这三种人：知之者、好之者与乐之者。

乐之者的欲望是自然而必要的。

好之者的欲望是自然而不必要的。

知之者的欲望是不自然而不必要的。

所谓知之者，就是迷信知识的人。这种人看似相信知识，其实没什么知识。人类最大的知识就是不迷信知识。

所以，企图“知道得越多越好”的人注定失败。他们企图从知识上了解世界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从本质上认知世界，不能从量上认知世界。一颗星星加一颗星星再加一颗星星，这样加下去不会等于头上的星空，因为在你加的过程中很多星星都已经不存在了，或转化了。

因此，从知识与经验上认知世界是不可靠的，必须依靠人类固有的心力与慧力。

我们认知自身也是这样的。哲人说：“认识你自己。”难道是要我们做一个综合的自我检测题吗？不，不是的。认识自己的意思是认识自己的本质与灵魂。因此，迷信知识的人是无知的，其欲望是不自然而不必要的。

所谓好之者，就是对某类事物有兴趣的人，如商人对钱，男人对女人，等等。这种兴趣是出自天性或环境的影响，其发生是自然而必然的。但是它注定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，因为对象太大了。虽然可以轻易击中，但得不到全部。

一支箭射进树林中只能射到一棵树，但不能射中所有的树。树林以被射中一棵树的方式吞掉了箭。欲望以被满足有限的方式吞掉了追求无限的人。因此，对无限欲望保持强烈兴趣的人也注定失败，其欲望是虽然自然但不必要的。

只有乐之者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，因为它是自然而必要的。快乐使人与世界合二为一，这种欲望符合自然之道，使人与事与物达成和谐，所以能顺心如意。当然这指的是真正的乐于为之者，而不是貌合神离者。

人们之所以有时做不好事情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没有真正地成为“乐之者”。你要是真正地乐于做某件事，你就会成为你要做的事情本身就会成就你，成全你。所谓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即包含这层意思，智者乐于做水就会成为水，仁者乐于做山就会成为山。在下一章中我会展开来讲，在此需要说明的是：只有真心喜欢一件事情，我们才会成功。原因简单，真正的喜欢投入就多，能量一充足，就可以发电，把事情干成。

孔子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显然是把“乐之者”作为了做人的最高境界。

只有乐于做人的人才会成功。

从前有个闲适的有钱人问古希腊智者西塞罗：“你是否愿意坐下来探讨真理？”

西塞罗回答道：“与其与一个普通人一起认识真理，不如同柏拉图一起犯错误。”

西塞罗的意思是：知识上的探讨我已不感兴趣，现在我只关心精神上的愉悦。

精神上的愉悦者就是孔子在此说的“好之者”，一个从心里喜欢的人。

冬天的时候，河里都快结上冰了。有人看见希腊智者米松光着身子在河水里捉鱼。人们惊异地问：“米松先生，你不穿衣服难道不怕冷吗？”

米松举着手里的鱼笑道：“它们也没穿衣服啊。”

愚蠢的人会指出米松的这个行为根本不明智，不能叫智者。而见此能会心微笑的人明白米松为什么会这样做：他快乐呀，他得自然之道 这就是智者。

中国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喜欢喝醉了倒地就睡，经常睡在酒店老板娘的身旁。酒店老板开始以为二人有染，日久细看根本没这事，阮籍只不过是喜欢这样罢了。

如今 像阮籍这样的‘好之者’已经不多了 而像孔子这样主张人生为快乐的智者也越来越少。

喜欢读书的人与喜欢喝酒的人，这两种人是最有品味的，他们明白如何才能让自己爽起来。但光这样还不够，我们要把心灵开放出去，接收进来，用心聆听先哲的启迪，这样就不用数也知道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了——

一种说法是天上只有一颗星星，还有种说法是天上——一颗星星也没有，惟一的一颗跑到地面仰着头数星星去了。

既然你已经仰着头那就望吧望吧，数吧数吧，数累了你就不数了。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说：

“主啊 原谅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如果已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，那么人类就会正确而快乐，不会再有无谓的牺牲与浪费。

孔子说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也同时在点明：快乐来源于对本来的认知，有真知才能真乐。因此，乐之者也必是好之者与知之者，这样他的快乐才有所依附。

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”。孔子这话等于说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。知道一件事不如喜欢一件事。喜欢是一种大知识。佛经上把喜欢佛学的

人称为“善知识”也是这个意思。

希腊智者西塞罗说：“与其与一个普通人一起认识真理，不如同柏拉图一起犯错误。”这句话也是重在揭示：一，热爱智者要大于热爱知识。二，喜欢一个人或喜欢一件事本身就体现了知识。

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孔子这句话是说：做一件事光凭爱好还不行，还必须不断收获快乐才能成功。这时人是忘我的，天真的，自然的，活泼的，就像希腊智者米松冬天裸体下河捉鱼一样，看似疯癫，其实是自然。

米松多么天真，说鱼“它也没有穿衣服呀”，对真理的痴迷非常可爱。孔子也是放浪形骸的，无论是杖击原壤时，还是登泰山而小天下时，无论是在齐闻韶时，还是周游列国、藐视天下君王时，都体现了一种“乐之者”的超凡风度。孔子风度一路传下来，形成了后世著名的魏晋风度，代表了中国人（特别是中国男人）最有品味的一种生活。

3

“和”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个准则

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

大千世界里唯其保持个性的矛盾统一才算得上真正的“和”，而简单的盲从附和、绝对的同一则不利于事物的发展，也就不为君子之“和”。

孔子倡导“和为贵”，也主张“和而不同”，主要强调心心相印和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。他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在他看来，大千世界里唯其保持个性的矛盾统一才算得上真正的“和”，而简单的盲从附和、绝对的同一则不利于事物的发展，也就不为君子之“和”。

孔子把“和”看成处理国家关系、种族关系及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，十分重视社会的整体和谐。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《礼记》中的“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”，一言以蔽之，道出了和的极致。

孟子则强调“人和”，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）。荀子则以人能“合群”为本，引出“和则一，一则多力，多力则强，强则胜物”的道理。他说：“力不若牛，走不若马，而牛马为用，何也？就是因为‘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’。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

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，历来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教育的核心，蕴含着宇宙一体的丰富哲学内涵。几千年来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大力倡导下，于潜移默化之中，孕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、团结豁达、宽容博大的胸怀。

关于孔子的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，影响最大的是 1988 年 1 月，一批诺贝尔得奖者，在法国巴黎召开的“人类如何面向 21 世

纪”讨论会上 瑞士 1970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汉内斯·阿尔文博士关于孔子评价的一段话。阿尔文博士说：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到 25 个世纪以前 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

战争，不是现在这些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家发明的。但无论是东方或西方，一些具有高瞻远瞩的优秀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从未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、种族和不同利益与文化群体之间冲突的唯一手段。在中国公元前 514 年吴王阖闾即位前，便读过当时优秀军事家孙武著的《兵法十三篇》。这本书一开始便说：

“兵者 国家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。”

指出：战争是关系人民的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大问题，不能轻率地随便运用。接着便对战争的方式、方法提出了“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。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即调整自己国家的方针、策略 不用打仗的手段 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化解了双方的争论 作为是“善之善者也”的最好用兵办法。

以此为指导思想 孙武又提出“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。”将运用外交手段与和平谈判等方法交换彼此对冲突的认识，在相互沟通问题性质后，提出彼此均可接受的方案，以解决双方的矛盾。将这种不用作战而取得胜利的方法，作为立国安邦和行军作战的指导思想。而将指挥军队在战场上相互残杀，用强兵猛将和精锐武器去攻陷他国的城池，俘虏他国的人民 占领他国的土地 作为是用兵中“不得已”的最下策略。

可是，在现在世界中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军事家，他们往往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，抛弃了中国军事家早在二千多年前便提出的用兵的“善之善”策略 而采用了“不得已”而用的“下之下”攻城掠地办法。

所有有深谋远虑的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等 他们并不只看眼前的胜利，还要看到形成这些国家、种族、文化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。主张通过和平、平等、协商的原则，从根本上去解决才是最好的策略。中国三国时的诸葛亮 便有从内心上降伏孟获 采用了“七擒七纵”方法，即捉住孟获七次，又放了七次，然后使孟获说：从此我不再反了。成为战争中以攻心为最佳历史典故。

与孙武基本同时的中国伟大教育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孔子 他从“仁者爱人”出发 重视人生命的生存。主张“富民”、“教民”、“安民”、“以民

为本”使人民有吃有穿，受到应有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。他收学生时不分地区、种族和贫富贵贱。当有人用陶土做成的人俑殉葬时，他也严厉地斥责，说到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孔子认为人俑虽然是用陶土做成的，但它已经造成人的样子，你还忍心将它埋葬，这种没有爱人观念的人是要绝子绝孙的。

当他的马棚失火时，他首先问：是不是有人受伤？而不问马。当他对当时从政的官吏和历史上人物评价时，是以他们对人民是否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作标准。由于孔子强调人应当有吃、有穿、有受教育、能生活、生存的权利所以他极力反对“强凌弱”、“大欺小”、“众暴寡”的不义战争。主张通过“己欲立而立人”、“己欲达而达人”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“推己及人”思维方式去解决分歧和争论。

他教育人，不仅只看到自己，还要想到他人。当你的国家、种族和个人想得到某种利益时，你应该想到其他人的国家、种族和个人也想得到这些东西。当你想到你的国家的安全、利益、地位和声誉时，你应当想到其他人的国家也有他们的安全、利益、地位和声誉。不能只知有己，而无视他人，甚至用损害他人、养肥自己的思维方式办事。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，只知自己，无视他人，实行了强权政治，无视公理、正义和国际公约与人类道德准则的人，是一定要失败的。

孔子“推己及人”的思维方式是从“彼与此”、“我与他”双方出发去思考问题，这样才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去寻找出争论的根本原因，然后再根据平等的原则，找出彼此都可接受的方案，一次不行，下次再议，反反复复最后总可以找出一个代替不用杀人放火、飞机炸弹，杀得彼此都得不到安宁的更好方案来。

人们常说：在当今科学技术日夜不断发展的世界中，你要想生存下去，也应当让他人能够生存下去，如果你使他人无法生存下去，结果你也将生存不下去；你要想得到安宁，也应该让他人能安宁，你如果使他人无法安宁，你也会得不到安宁。这就是现在世界的客观事实反映出来的辩证法。

孔子在与他的学生有子谈到治理国家，对“礼”这一当时公认的行为准则如何掌握和运用时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就是说“以和睦相处、和平友好、相互尊重、团结友爱、通过协商、化解冲突的”和“这种思想方法最好。并认为“和”这种思想方法是古代的“先王”治国安邦“大道”

中最好的方法，大大小小的事，均以它为尺度去处理。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，他通过齐、鲁“会盟”友好协商这种方法，收回了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。当他在任鲁国的“中都宰”时，使这个城市成为社会安定、秩序井然、商贾来归“四方皆则之”的典型。

孔子虽然认为“和”这种方法，在处理各种相互关系与争论中，是一种很好的方法，但也认为“不能为‘和’而‘和’，失去公认的是非标准‘礼’”。在孔子“摄相事”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时，孔子认为“齐国是大国，常欺负鲁国，此次相会，虽是‘文事以和好为主，但必有武备，并请具左右司马’，带领一定军队同行。当两君相会，齐国想利用暗藏兵器的乐队挟持鲁定公时，孔子立刻‘趋而进，历陛而登’，对着‘晏子与景公’说：‘吾两君为好之会，夷狄之乐，何为至此？’景公心忤”，知鲁国带有随从的卫队，乃撤去了暗藏武器的乐队。自认为“失礼”与“道义”不符，乃归还“所侵鲁之郛、汶阳、龟阴之田，以谢过”。这是孔子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，不用战争而收复自己国家失土的真实历史。这段历史采用的方法，主要是和谈，坚持以“礼”服人，促使齐国归还鲁国土地。

孔子虽然主张以“和为贵”，但又强调“和而不同”。就是说，国与国、种族与种族、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分歧，应该和平协商，化解争论，和平相处，不要采用战争和仇杀的方法。但“和”又不是彼此混合在一起，而失去了国家、种族和个人的独立地位，使多元并存、五彩缤纷的不同文化、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完全一致，这既是违反人类发展的规律，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。“和”是解决彼此之间分歧而达到人类一家，人类群居生活中彼此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的一种思想方法；“不同”则是保持国家、种族、文化和个人的特性与独立的地位。

“君子和而不同”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，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。和谐以共生共长，不同以相辅相成。和而不同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，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。历史的长河跨过了两千年，自然与人类面临更多的问题。

在春秋战国有王道与霸道之争，儒家是主张王道而反霸道的。当今的霸权主义者，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的霸主。他们的哲学指导思想与“和而不同”正好相反，不是要社会和谐发展，而是要弱肉强食，不是和平共处，而是要用战争解决问题。这样一来，社会危机就严重了。

人类生存需要“以和为贵”；“和而不同”的理念太极理念是中华文明深层结构的精华，表征了一切统一体内部运动的情势。它既是孔子 and 老子关于“和”的辩证法的衍生，又十分形象地呈现了阴阳和合、和而不同、冲气以为和、和实生物、致中和、保合太和……等理念所表述的运动机理。一句话，它是传统理念中的对立物的统一。因此，中华文明中“和”的辩证法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，“和”的基本涵义是和谐。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、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。孔子主张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。孟子提出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就是以和睦、和平、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。

以“贵和”而论，中国人把“和为贵”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，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、和平与和谐；“和”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，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。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“和”；各守本分，互不干涉，“井水不犯河水”也是为了“和”；“和而不同”求同存异，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“和”。

总地看来，“贵和”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，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，使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，较为稳固持久，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。

4

. 像水一样多情，像山一样无忧

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(《论语·雍也》)

水依山而行，山因水而活。乐水乐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，也是最丰富的人生意蕴。临水而居、依山而居是人间最幸福的事。

智慧的人喜欢水，仁爱的人喜欢山。智者是动态的，仁者是静态的。智者是快乐的，仁者是长寿的。

我的家乡四川有个地方叫“乐山”，乐山大佛天下闻名。乐山原来叫嘉州，嘉州改名“乐山”就是取自孔子这句“仁者乐山”。

仁者为什么会乐山呢？

山是安定的。

山是高大的。

山是丰富的。

山是无忧的。

山的这四大美德合于仁者，所以叫“仁者乐山”。物以类聚，像山一样的仁者当然喜欢像仁者一样的山。

仁者爱人，爱心感化世界，因此是安定的。

仁者无敌于天下，因此是高大的。

仁者与天地相往来，因此是丰富的。

仁者快乐，因此是无忧的。

仁者爱天下，为何独爱一山？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，山对人的视野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。

山，有时起隔离作用，有时起连接作用，有时作界碑，有时作塔标。总地来说，当一座大山巍峨耸立在我们眼前，人除了会有一种本能的对大自然伟力的赞美外，会同时想到另外一些伟大的象征，如女神、国家、诗人、哲人、圣人等。

孔子曾把圣人比作山，赞叹尧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唯天为

大 唯尧则之。”而当他亲自登高山 又想到圣人。在此 圣人、仁者与高人是同类 所以孔子有“仁者乐山”一说。《史记》上说：

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

这种“小天下”的气度并非王者靠征服所能达到，而是通达自然之道的智者所独享。

山即圣人。

圣人看见山，就看到了自己的外化。自己的外化是如此瑰丽，因此“仁者乐山”。这是必然的。

“智者乐水”道理也相同。

水是流动不息的 即使是一潭死水 它也要上面蒸发 下面渗透 依然遵循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。

智者像水一样流动，生生不息。老子说“上善若水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智者除了像水的流动外，智者还像水一样多情。圣人是无情的，智者是多情的 他的人生充满喜乐欢欣。因此，“智者乐水”是他成为智者后的必然状态。

智者在喜乐自身的同时，对世人充满悲悯的情，他身上肩负播种欢乐的使命。

有人问希腊智者欧里庇得斯：“普通人为什么缺乏智慧？”欧里庇得斯答道：“智慧是由悲苦换来的，小悲苦换来小智慧，大悲苦换来大智慧 因此我们的智慧里总是充满怜悯。”儒家说“仁义” 佛家说“慈悲”，道家说“贵生” 墨家说“兼爱” 都充满一种人性关怀。

水是生命之源。

水是平等的。

无论是奇花异草，还是普通草木，甚至是毒花毒草，水都一视同仁，都给予滋养，成全它们走完生命全过程。

圣人不仅普施善者，同时也对恶者充满怜悯。佛陀当初舍身饲虎，就是此意。

当我写到这里时，一道金色的阳光从高空照射到了我的书桌上，我的心是如此喜悦与宁静。

太阳也是平等而博爱的。

太阳必须是博爱的，才会成为太阳。

水与太阳，这一阴一阳都共同揭示了如此浩大的自然规律，作为一个忠诚于自然之道的自然之子，他也必是如此。

“智者乐水”这种水无处不在 不分清浊 都是大地的乳汁。“沧浪

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。(屈原《渔父》)

我在一首诗中写道：

良乡的庄稼地银光闪烁

晨雾浮走树根

如牛奶浇灌大地

我在诗中把晨雾比作牛奶，不只是形容它的洁白，更意在指出它对大地的滋养。

牛奶是水。

人奶是水。

婴儿吃奶时对水的温柔、水的甜美必有极深感受，这种感受将指导他 她 终身去寻找一种更大的温柔与甜美。

我们作为成人，又怎能不去寻找另一种温柔与甜美呢？那就是人的真性情，真性情造就真正的人。

我的朋友沙漠舟把他的自传题名为《我在人间的日子》那么我想，只有真正的人才能活在真正的人间，否则与海市蜃楼何异？沙漠舟是个驼背，自比骆驼，说自己是沙漠之舟。作为一个残疾人作家，生存是困难的，但在沙漠舟身上我看到了孔子坚守的不屈意志。

《庄子》上记载孔子曾说自己：“丘 天之戮民也。”意思就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残缺的 所以要努力。这不只是身体上的缺陷 更有灵魂上的缺陷。

所谓智者就是残缺的人的生存方式。

所谓仁者，就是残缺的人爱自己。人都已经残缺了还不知道爱自己 那就不好了。

沙漠舟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屡次感化了我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

“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。”山水之间真正的人诞生了 他们将更加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老子说“上善若水”孔子说“智者乐水”都指出人应该像水一样流动而洁净。智者的智慧是透明的、流动的、浩大的、能解渴的 因此“智者乐水”就是乐他自身，体悟以一种天地证我的快感。

孔子爱山 孔子懂山 他“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一路越登越高，最后自己成为一座高峰。仁者心中的爱不会像山一样积压，却像山一样充满生机，又为世人指明方向。山是立起来的。“仁者立人”，人要像山一样立起来，靠的就是志向。世间什么志向最大？爱的志向最大。让人间充满爱 这是每一个人的使命。“仁者乐山”因为他看到一座又一座山峰终于升起。

5

人生三戒：年少戒色； 壮年戒斗；老年戒得

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

生命的成长虽是连续不断的历程，但呈现阶段性，每一个阶段都有特殊的发展任务与危机，惟有透过学习，才能顺利度过危机，找到生命的意义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有三种戒忌，年少的时候，血气尚未稳定，要戒女色；到了壮年，血气旺盛刚烈，要戒争斗；到了老年，血气已经衰弱，要戒贪得无厌。”

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孔子将人生分三个阶段，对人慎戒的名言。我们加上年龄、经验、心理、生理的体验，就愈知这三句话意义之深刻。少年戒之在色，就是性的问题，男女之间如果过分地贪欲，很多人只到三四十岁，身体就毁坏了。有许多中年、老年人的病，就因为少年时的性行为，没有“戒之在色”而种下病因。

中国人对“性”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很周密，这是在医学方面而言，但是很可怜的，在道德上对这方面遮挡得太厉害，反而使这门学问不能发展，以致国民健康受到妨碍。

据我所了解，过去中小学几乎没有一个青少年不犯手淫的，当父母的要当心！当年德国在纳粹时代，青少年都穿短裤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手绑起来放在被子外面，这是讲究卫生学，为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。这样的做法，虽然过分了，但教育方面大有益处。现在年轻一代的思想，女孩子愿意嫁给有钱的老年人，丈夫死了，反正有钱再嫁人；男孩子受某些外国电影的影响，喜欢爱恋中年妇女。这是一般的风气，也是一个